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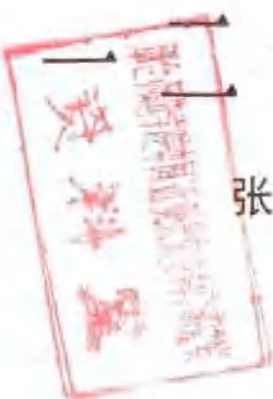


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

第四辑

论一二·一运动

张子斋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

论“一二·一”运动

张子斋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熊长靖

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
论“一二·一”运动

张子斋 著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成都军区后勤部驻昆办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96,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

统一书号：1184·67 定价：1.00元

出版说明

云南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许多优秀儿女的鲜血，遍洒祖国的万里河山，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激励人们为追求真理和美满幸福的生活，前仆后继地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云南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特别是云南各族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担负着为撰写中共党史和编纂中共党史资料丛书提供史料及征集、整理、编纂、规划出版云南党史资料的光荣任务。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自一九八一年七月建立以来，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经过广泛征集、专题研究，征集到大量的资料；各地有关的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和许多老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各地、州、市、县的党史办，也上报了大批专题材料。在这些资料中，有珍贵的革命历

史文献、图片、照片和文物；有著名烈士和党史人物的专著、文章、报告、书信和诗词；有部份同志在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资料，等等。这些资料，为我们进一步完成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任务，为编纂出版云南党史资料，创造了条件。

在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和《中共云南党史资料丛书》的同时，我们将未能收入丛书的一些重要史料，编成《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分辑陆续出版。这套研究资料，力求从各个侧面，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历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服务。

《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按资料来源，由中共云南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指定本单位的业务人员、或与有关单位协作、或由提供资料的单位负责编辑。书编好后，邀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帮助审定，请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云南现代革命史料极为丰富，我们征集到的还很不完备。为了把这套研究资料编好，希望各级党政部门、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烈士家属及其亲友、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我们提供资料。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 序言..... (1)
- 论“一二·一”运动..... (11)
- 发扬“一二·一”运动精神
- 一一为崇高理想努力奋斗..... (70)
- “一二·一”运动的历史意义..... (84)
- 斥李宗黄..... (97)
- 一线转机..... (103)
- 严重的关头..... (112)
- 东北问题的症结..... (119)
- 新形势下的新闻工作者..... (129)
- 严重局势下的昆明惨案..... (138)
- 祭闻一多先生..... (145)
- 闻一多颂..... (150)
- 杰出的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战友
- 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四十周年... (175)

序 言

收在这里面的十二篇文章，其中《一二·一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发扬一二·一运动精神，为崇高理想努力奋斗》两篇，是为纪念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而写的，《闻一多颂》，是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闻一多先生殉难三十五周年而写的，《杰出的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战友》，是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四十周年而写的，其余几篇，都是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七月这段时间，即两个中国之命运进行最后决战的的前夕，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变化急剧的时期写的。此次出版，仅修正了个别词句，未作重大修改，基本上保持了本来面目。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有必要作些说明。

对于一二·一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当时就作了高度的评价。国内许多著名的民主战士和进步的舆论界都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并热情赞颂这个运动在两个中国之命运进行最后决战时刻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就在国际上也有强烈反应。

这个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领导的群众性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之一。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有利于革命人民，而有利于反对派的明显变化：我们党的队伍空前壮大，威信日益增高，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更加成熟和更加丰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获得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政治鉴别力大大提高，他们从切身体验中看透了蒋家王朝的反动本质，摆脱了欺骗宣传的影响，抛弃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风起云涌地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大军，为保卫八年浴血抗战的胜利成果，建立新中国而奋勇前进，形成了日益高涨的席卷全国的革命高潮。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形势的显著特征。一二·一运动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特征。这个运动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我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人民在内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民主运动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亿万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运动同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斗争紧

密配合，形成夹击和包围蒋介石王朝的有利形势，敲响了这个王朝在政治上完全孤立，正走向彻底覆亡的丧钟。这个运动也使广大群众受到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斗志，坚定了信心，为以后不久在蒋管区正式开辟第二战场作了较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可以说，一二·一运动是蒋管区人民冲决一切网罗开辟第二战场的强有力的预演和奋勇进军的号角，是打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未来的伟大史诗的前奏曲，它响亮地宣告了光明的新中国即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胜利诞生，这是中外反动派都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

一二·一运动距今已经四十个年头，但这个运动的光芒并未被时光的灰尘所淹没或冲淡。相反，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的检验，有力地证明了一二·一运动方向的正确性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去年，由于中共云南省委的重视，曾在昆明隆重地举行了纪念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的内容丰富的活动，建立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概括地重现了当年的斗争情景，缅怀先烈，对广大青年生动具体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举行学术讨论，回顾运动的历史，对它的伟大意义作了再认识和再评价。云南师大的同志，多年来不辞辛劳，在搜集整理一二·一运动史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二·一运动史稿亦正在

积极撰写中，成绩斐然，令人高兴。与此同时，一些曾经直接参加运动或目击运动发展情况的同志都感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不论广度和深度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做拾遗补缺的工作。为此，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一切狭隘的主观的框框的局限，把视野开放得更广阔一些，采取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众所周知，以西南联大为首的四个大学是一二·一运动的核心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因而把他们列为搜集史料和研究史实的重点，也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而在这个重点中适当强调为首者的作用，也是应该的，但必须顾及其它三个大学的作用，正如俗语所说“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这才符合历史实际。还应该着重指出：三十多所中等学校的数万师生，是这个运动的雄厚的直接的群众基础，有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在这些学校中做了艰苦的工作，团结广大师生，使这个基础在腥风血雨中始终坚如磐石，坚持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倘没有这个基础，一二·一运动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许多工人、农民、社会青年、各界爱国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或支持这个运动，云南全省很多县的中学都积极响应，现有的史料，对上述几个方面，显然是搜集得很不充分的。当时全国好

些地方举行了支持一二·一运动声讨反动派的群众大会，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发表了谈话或文章，蒋管区内一些有正义感的报刊，也对运动作了比较公正的报道和评论。这方面的史料虽然搜集了一些，而遗缺殊多。在剧烈的斗争形势面前，知识界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一大批有影响的教师、学者旗帜鲜明地站到革命人民一边，勇敢地参加或热忱地支持这个运动，其中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杰出战士，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前列，增强了大家的斗志，影响很大，不愧为青年的导师。有的虽不敢公开行动，却对运动深表同情，有的则保持中立。但也有少数人利用学者教授的头衔和传统的影响力，打着“公正”的旗号，发表了一些貌似爱护学生，实则左袒反动派的似是而非的论调，或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手法，这比起官方的赤裸裸的谬论，颇能迷惑一些人的耳目，可惜这方面的资料尚未搜集起来。反动派为了镇压青年学生和革命人民，用尽心机，施展种种阴谋，并调动了全部舆论工具，声嘶力竭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造谣污蔑，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无所不用其极，乌烟瘴气，弥漫一时。在现已搜集起来的这方面的资料中，有一部份相当重要，但份量显然大大不够。我想：如果能够把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二·一运动时期的一连串阴谋

勾当和大量形形色色的反动言论能够全部或大部份搜集拢来，汇为一编，那将是对于在红旗下长大完全不了解国民党黑暗统治情况的广大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颇有用处的反面教材，也当然是认识一二·一运动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反证。当然我们的着重点是正面教材，但也应当适当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类问题的应有的态度。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搜集史料的工作，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同这个运动的宏大规模和斗争实际还不相称，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和搜集史料的工作。只有在充分掌握各方面史料，反复核实史实的基础上，才能写出准确可信的生动的、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的一二·一运动史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不完成这个使命，那将是愧对先烈，也无以向后人交代的。我之所以把一些拙作结集出版，意在抛砖引玉，期以引起各有关方面和有关同志对这项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我对于一二·一运动，没有什么贡献可言。但我是这个运动的自始至终目击者和关心者之一，它使我受到深刻教育，也从中获得鞭策自己的力量，根据党组织指示的精神，并集中直接参加运动的部份青年的集体意见，写了《论一二·一运动》这篇

文章。首先要指出的是，由于一二·一运动的洪涛巨浪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禁令和检查制度，这篇文章才得以《民主周刊》的副册的形式出版。在这篇文章中，除主要从正面阐述一些问题（当然阐述得不够好）外，着重批驳了反动派的某些谬论和实际上为反动派所御用而伪装得相当巧妙有一定迷惑作用的一些论客观的阴阳怪论，我认为在当时这种批驳是非常必要的，尽管批得不够透彻。有的同志认为：在那时比较全面地阐述这运动有关问题的，“只此一篇”，这是过誉之辞，愧不敢当。而且，即使真的“只此一篇”，也并不表明了它的真正价值。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个人水平的局限，这篇文章难免有若干缺点以至错误。又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的表达形式，使人感到这个运动好象不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议在文章前面作点简要的说明，这种好心是可感的，却又是我不敢苟同的。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个人从事地下工作的身份，我主观上作了最大努力，只能采取这种表达形式，而不能采取别种表达形式。在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烈，各种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如果完全不顾地下斗争的特点和应该严守的一些准则，轻率地在这篇文章中公开流露或暗示这个运动是我们党领导的，以炫耀自己，那将不仅仅是害了一般

的“左派幼稚病”，而且是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严重失误，给国民党反动派提供造谣攻击的炮弹，造成被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地下工作时期的事件和作品，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而不能用我党是全国执政党以后的眼光和尺度来衡量和苛求，可以说这是常识问题。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浩劫，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完全不了解解放前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情况和地下工作的艰难曲折和特点，连常识也缺乏，先入为主，吹毛求疵，主观臆断，无限上纲，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由此感到，要正确地评价一二·一运动，写好这方面的历史，必须首先对当时斗争形势和历史条件的各个方面，作马克思主义的估量和分析，尽量避免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避免如恩格斯所说“用唯物史观来剪裁历史事实”，避免把现在的一些想法和作法作为唯一的标笺强贴在过去的历史上，避免用多年来形成的深度的“左视眼”来看待以往的历史。

紧随着一二·一运动之后，斗争形势有了急剧的发展，为便于读者了解这期间的形势，把《东北问题的症结》和关于李闻惨案的几篇文章都收入这个集子里。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民党反动派利用

所谓的东北问题，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有的被御用或一时迷了心窍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呼“东北是我们的母亲”而痛哭流涕。反动派还驱使不成队伍的“乌合之众”在昆明街头“游行示威”，呼口号，贴标语，其中竟有“打倒闻一多夫”，“打倒楚图南斯基”，“打倒艾思奇斯基”这样自以为绝顶高超而实则无比卑劣的花招。稍有政治警惕性的人们都预感到反动派又在磨刀霍霍，要施展新的阴谋和血腥手段了。就我所知，李公朴、闻一多都是分明知道这个危险的，但他们巍然不动，泰然自若，抱着“走出家门就不准备回来”那样视死如归的坚强决心。闻一多遇难前数小时，我还和他在一起开会，他象平常一样沉着、坚定和热诚。现在回想起他那种憎爱分明的态度，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藐视反动派的宏伟气魄和对人民对青年的火一样的热情，仍令人肃然起敬，奋然前行。没有多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美制武器刺杀了曾在美国留过学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制造了又一个震惊中外，连反动派的美国主子也感到相当难堪的惨案，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云南，大有“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声动地哀”之状。但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本来已经零落不堪的政治资本很快就输光了，永远捞不回来了。而这之后

仅仅三年，反动派的庞大军事资本也输得精光，一败涂地，应了鲁迅早就说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偿付更大的利息。

今年是李、闻两先生遇难四十周年纪念，仅以此书作为奉献给这两位全力支持一二·一运动的杰出的民主战士的花环，略表怀念和景仰之忱。

张子斋

一九八六年五月

论“一·二·一”运动

本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作为《民主周刊》副册刊行，署名史刚，由著名民主人士、史学家吴晗先生作序。

吴晗先生序

当然，我是乐于有先读这本小书的机会，乐于能为它尽一点校读的义务，更乐于自动为它说几句话。虽然，是带着沉重而激昂的心情来读它。

正如作者一样，对于这运动，我是目击者。二十五日晚的晚会，我坐在主席台旁面，我在听讲演。我也在听机关枪声，小钢炮声，步枪声和讲演声竞赛，我目击几千青年大无畏精神的表现，我也目击自称老百姓的特务的丑态。十二月一日的屠杀，我是“耳击”者，我听到捣毁器物声，殴打挣扎声，小学生惊极号哭声，也听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轰然手榴弹爆炸声。我亲眼看到屠杀后捣毁后的实况，亲眼看到死者或伤者的血，亲眼看到死者入殓，亲眼看到受重伤者的痛苦，和锯掉的腿。我每天到灵堂巡礼，细读新增的挽联，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公正的判决书，也注意观察来吊